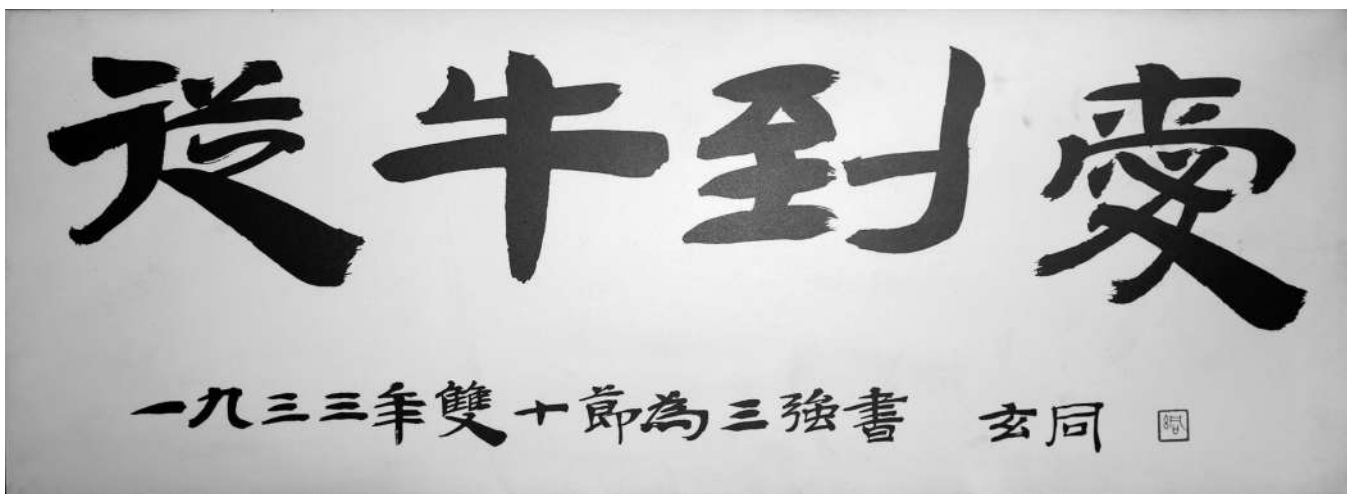


# “从牛到爱”

## ——钱民协讲述钱三强的故事

本报记者 付裕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曾为钱三强题写“从牛到爱”四个大字，希望钱三强能发扬属牛的“牛劲”，也希望他能在学业上不断进步，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

字。”钱民协说：“这是我们永远的思念。”

###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教育，就是尊重孩子的意愿。”钱民协表示，在教育方面，尊重孩子的意愿，才是家长最好的做法。

钱民协讲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中学时，钱三强的同班同学写信给他，信中称他为“三强”，钱玄同看见了，饶有兴致地问“三强”是谁。钱三强回答：“‘三强’是同学对我的称呼，因为我排行老三，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故称我‘三强’。”当时，钱三强的名字是钱玄同按照传统的排行取的，叫做钱秉穹。对钱三强这个名字，钱玄同很是称赞，他说：“这个名字不错。‘三强’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德育、智育、体育都进步。”从此，钱秉穹改名为“钱三强”。

“对于我们子女的教育，父亲也是按照我们的意愿，从不过多干涉。”钱民协回忆道：“大学时候学习什么、报什么专业，父亲都是让我们自己去来。到我们的子女，我们也是尊重他们的意愿，按照他们的意愿来。”

“1986年，父亲出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科技界青年学者座谈会，并在座谈会上作了回顾自己青年时代学习生活的主题演讲。”钱民协回忆说，后来这篇演讲，经整理成文为《锻炼身体、扩大视野、培育拼搏精神》，刊载在1990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人谈少儿时代：风雨年代》一书中。

“父亲的手稿，记录着他对于少年儿童的期待，也承载着对我们永恒的思念。”钱民协动情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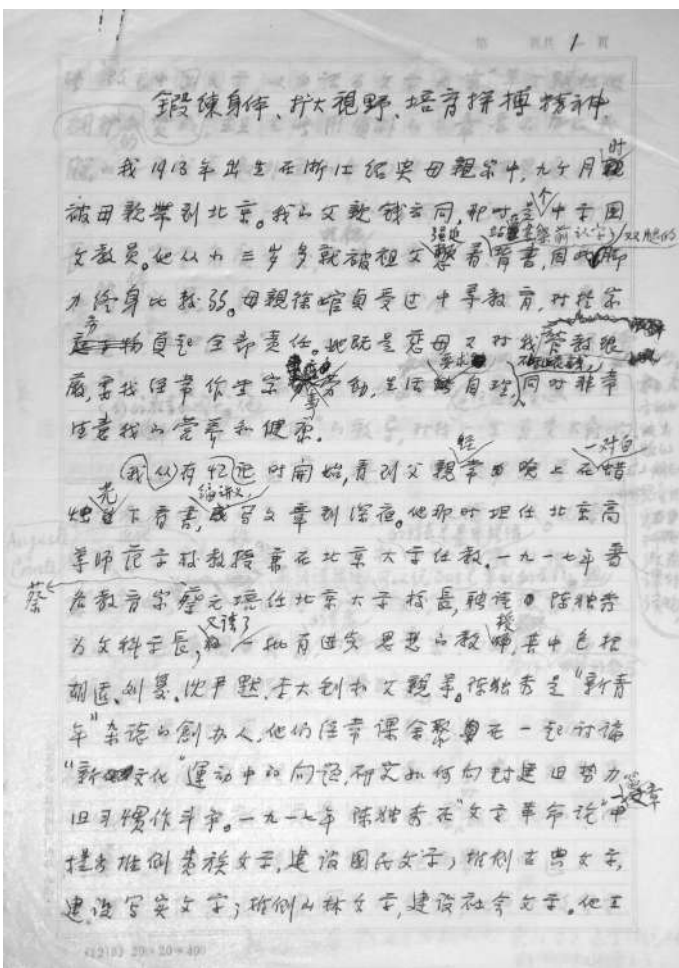
### “从牛到爱”

“这幅书法，一直挂在墙上，鼓励着我们。”钱民协对本报记者说。1932年秋，在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就读的钱三强决心放弃电机工程专业，改学物理，并考入清华大学重读一年级。对此，钱玄同什么都没有说。1933年，钱玄同别出心裁地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送给钱三强，这四个字成为他一生的珍藏。

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语言文字学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钱民协说：“爷爷的书法，非常漂亮，文学功底特别深。这里面‘牛’指牛顿，‘爱’指爱因斯坦。我父亲属牛，爷爷当时写下这四个字，就是希望父亲能够发挥他属牛的那股‘牛劲儿’，也希望他能够不断进取，向牛顿和爱因斯坦学习。这句话，成为父亲的座右铭，也一直激励着我们。”

“父亲曾经说，他属牛，做什么事儿，都要认认真真地，像孺子牛一样，对社会贡献多，从社会索取少。”钱民协说，“从牛到爱”的意思是在科学上不断往前走，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要向他们学习。

“父亲把这四个字一直挂在他的书房，后来，在他的墓碑上，我们子女也刻上了这四个



钱三强手稿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的故事

钟同福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件珍贵的文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仿造民国三年银圆钢模。该文物是用来制造银圆的模具，由钢铸成，分成上下两部分，下部是四棱台模座，模座的下底长7.8厘米，宽5.8厘米，上底长6.3厘米，宽5.5厘米，高2.2厘米；钢模上部是边长为2.5厘米、高1.1厘米的正六棱台钢印模型，其上刻有一个直径为3.9厘米的圆，圆内阳刻袁世凯半身侧面头像，头顶上部呈月牙形阴刻隶体“中华民国三年”六字。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定都瑞金后，国民党一方面继续加大军事“围剿”的力度，另一方面对中央苏区实行了残酷的经济封锁，蒋介石甚至把经济封锁看得比军事围剿更重要，他曾这样训令：“将匪区严密封锁，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以后对于匪区封锁的种种办法，一定要密切实行，这一点比和匪区作战还要重要。”在如此严密的经济封锁下，苏区内急需的药品、布匹、食盐等物资也无法进入中央苏区，几百万苏区军民的生活异常艰难，也严重影响反“围剿”斗争。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积极发展区外贸易，派出人员去采购物资，并进行区外贸易就需要大量能流通的银圆。因此，筹集银圆成为了一件关系国计民生以及反“围剿”斗争的大事，苏区中央造币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苏区的造币厂最初是由兴国县东村乡几名银匠在1929年开始创办的。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接管了该厂，改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工人增加到20多人，原料也很充足，平均每天能造出银圆500余枚。1931年冬，造币厂负责人谢里仁奉中央政府的指示，带着十多个江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铸币师傅一起来到瑞金叶坪洋溪村，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迁往瑞金，成立中央造币厂，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直接领导。

中央造币厂建厂初期采用的是手工铸币，因为方式非常原始，工人每次铸造银圆都非常吃力，个个干得气喘吁吁。开始时，造币厂手工造币大致操作

程序是：炭炉把银子熔化再把银水倒进石板做的模具里，铸成长条形的银块，然后把银块绞压，剪成与银圆差不多大小的银坯，放在钢模里，最后冲压成型。冲压的工具是一块两百多斤重的条石，设有冲床，就用木头做起重架，用麻绳吊起条石，把刻有图案的钢模夹住银坯，突然放下条石，靠条石的惯性把银坯压成银圆。由于条石冲压时力量不均匀，着力点不准，造出的银圆很粗糙，边缘也没有花纹，要用砂打磨出光亮来。如此繁琐的工序制造银圆，一个环节没有做好，就要拿去回炉，既耗人工又浪费木炭。

1932年3月，红军在福建上杭县地区缴获了一套铸币机和钢模，并很快地运送到中央造币厂。这台铸币机是铸造毫洋的，中央造币厂的工人师傅将这台机器进行改装。这样，中央造币厂开始半机械化生产能流通的银圆。据谢里仁回忆，产量最高时每天能生产银圆一万余个。

1933年夏，中央造币厂的铸币机由于负荷太重，机器坏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指示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尽快从白区购进铸币机械。江口外贸分局接到任务后，通过赣州商人，很快从上海买回一台能铸“老鹰边”的机器，还购回了一批供制造钢模的“马金钢”。1933年冬，红军又在福建沙县缴获了一套铸造银毫子的设备，运回造币厂，至此，能在白区流通的“老鹰边”源源不断地被铸造出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长征，中央造币厂留在苏区，但停止了造币生产。厂长谢里仁将工人组织成运输队，将造币厂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运输到于都县高陂龙山村。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工人们在附近山区埋藏好机器设备，一部分人员编入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参加游击战争，一部分人员疏散回家。造币厂的几十担银坯由政治保卫队护送，后被秘密埋藏在于都县上坪、屏坑一带山区。

90多年过去了，这件中央造币厂仿造民国三年银圆钢模，作为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人民在经济领域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特殊的战斗的见证物，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 第六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生论坛举办

本报记者 付裕

日前，第六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生论坛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举行。论坛旨在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等学科的交流和研究，践行文化使命，助力培育新时代英才。

本次论坛共设三个分论坛，首次设置城市考古方向，议题集中在建筑考古、考古学理论、古代壁画研究等多个方面；其他两场分论坛议题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本次

论坛由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文化遗产研究所、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收到来自中国各省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首都博物馆等单位论文70余篇，经过初审，有46篇论文入选参会。与会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多层次的解读，学术观点精彩纷呈，体现了多学科互补、文理融合的“新文科”特色。

# 孙其峰中国画教学文献展亮相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

本报记者 李冰洁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2023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入选项目“传承与转化——孙其峰中国画教学文献展”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展出了孙其峰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创作的近百件课徒稿以及部分精品佳作，同时还集中展示了包含其教学、创作、随笔笔记的17个笔记本，以及历年的出版物等文献资料和教学影像，立体地呈现了孙其峰在中国画教学上的丰硕成果。

孙其峰是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重要奠基人，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传薪

者，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和弘扬者。1920年，孙其峰生于山东招远；1947年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科；1952年至1980年先后任河北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教师、系主任；1980年至1983年任天津美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作为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科的奠基人，孙其峰的艺术思想与教学思想是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与教学特色的重要支撑，他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花鸟画教学体系与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书画艺术人才。

# 珍贵的《龙渊义塾记》石碑

陈小龙

浙江省龙泉市博物馆内收藏有一块《龙渊义塾记》石碑，翔实地记录了被朱元璋尊称为“浙东四先生”之一的章溢在元末兴办龙渊义塾的经过。碑文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所撰。

龙泉于唐乾元二年（759年）置县，“山川雄秀，必产英才”，宋天圣至咸淳年间，仅进士就多达260名，“馆章授，著声誉者更仆难数”。然而，龙泉山高河险，与通都大邑相距甚远，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势，乡间子弟没有求学之所，文风逐渐衰落。章溢祖辈们曾先后谋划创立桂山、仙岩两处书院，因为没有土地、田园、房屋等不动产，不久都废弃了。章溢由此萌生了创办义塾的想法。

这一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坎坷。章溢在自撰的《龙渊规约》中描述：“于是与诸子躬耕于新丰之郊，十余年间，铢积寸累，始得置田建塾。”也就是说，不辞辛劳、节衣缩食十余年，才有了足够的积蓄，于是散尽家财，购买田产一百五十亩开始建塾。期间，章溢还得到了妻子家族人的鼎力相助。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九月，义塾在柴安村落成。

章溢在官山的北面修建了燕居供奉先圣孔子，后来又开辟了正义堂。在书院前建造大门，上书“龙渊义塾”，用青砖铺路，使东西通达。书院四周灌木丛生，修竹林立，前后蔽荫，亭亭如盖。彼时的龙渊义塾，书声琅琅，弦歌不辍，翰墨生香……

龙渊义塾建立了一套规范有序、奖罚分明、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对于学业长进者，每月有赏赏；才华出众但家境贫寒者，则资助其以成学业；那些不遵循教导的，就惩罚他们。三百多亩的田赋出入收支，由主持私塾的人全权负责。每天的用度都有记载，一月一考查盈亏，每年两次

轧账，有节余的就另外存贮起来，更多地置地以扩充产业。

作为一代儒学大师王毅的得意门生之一，章溢深受恩师影响，志在圣贤之学。“入吾塾者，当以孔孟为师，颜闵为友，所读者，六艺之科，诸子百家之异户，勿攻也，所履者，六德之教，权谋术数之偏说，勿习也。”他还谆谆告诫学子们要潜心向学，不要急于从政当官，读书著文切不可急功近利，要锲而不舍，循序渐进，明悟道理，不断充实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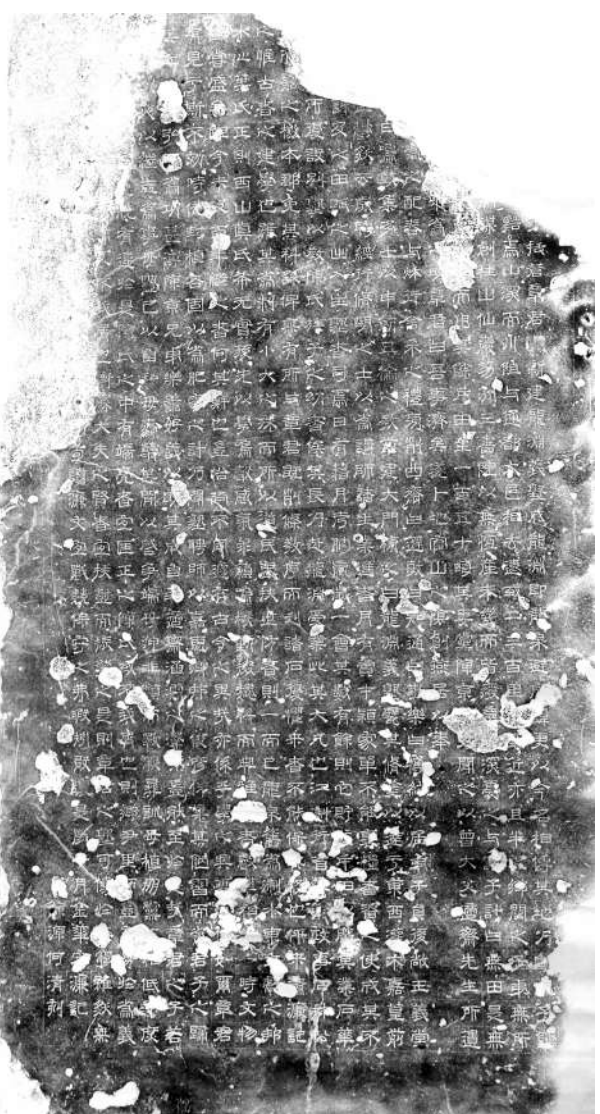
江浙行省参政知事得知此事，非常赞赏，在郡内下令免除学田的赋税和生员的徭役，解除了办学的后顾之忧。

章溢后来将列出的条款依序刻写在石碑上，又担心后人不能够坚持执行到底，就特意请至交好友宋濂撰写了《龙渊义塾记》，文章结尾处告诫子孙们应当时时刻刻把继承章溢的志向（办好义塾）作为自己的事业，不要贪图富贵而聚敛钱财，不要搬弄是非而引发争端，不去培植朋党互争高低，更不要亲近行为不端之人。其言恳切，其情殷殷。

邑人感佩章溢的仁义高风，也仰慕宋濂的文学才华，将《龙渊义塾记》刻写在石碑上，此作为宋濂仅存的隶书作品，行笔劲健，章法严整，气韵恬适，功力毕现。石碑高193厘米，宽93厘米，厚13厘米，立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九月甲子。

龙渊义塾早在清代就已毁坏，石碑却保存至今。虽然右上角损毁，有的字迹已不可辨识，却抹不去那段久远的历史。

（作者系浙江省龙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



龙渊义塾记拓本



## 红漆戗金缠枝莲纹杆笔



清，通长13.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红漆戗金缠枝莲纹杆笔由木旋削、雕刻、套合而成。此笔作为清宫戏曲演出所使用的道具，与实用毛笔十分相像。笔杆通体髹红漆地，再填金描绘缠枝莲纹，做工细致精巧。在“跳魁星”戏曲表演中，魁星执此笔起舞，以示点中状元。